

【日】陈舜臣
中国的历史

著

郑民钦译

中国的历史

解读历史，每个人或者说每个层面的人
都有自己的视角。

——陈舜臣

第七卷：斜阳和黎明
中华的飞跃

【日】陈舜臣

著

郑民钦译 斜阳和黎明
中华的飞跃

中国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

第七卷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 福建人民出版社

THE STRAITS PUBLISHING & DISTRIBUTING GROUP |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的历史. 第7卷 / (日) 陈舜臣著; 郑民钦译.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3. 12
(陈舜臣作品系列)

ISBN 978-7-211-06507-3

I. ①中… II. ①陈… ②郑… III. ①中国历史—普及读物 IV. ①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07402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3-2010-021 号

Copyright © 1990 by CHIN SHUN SHIN

简体中文翻译版权由创译通达 (北京) 咨询服务有限公司独家授权代理

中国的历史 (第7卷)

作 者: (日) 陈舜臣

译 者: 郑民钦

责任编辑: 潘静超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福建人民出版社

地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政编码: 350001

网 址: <http://www.fjpph.com>

电子邮箱: fjpph7211@126.com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 (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64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11-06507-3

定 价: 39.80 元

目 录

斜阳和黎明

- ◆ 海陆的裂痕 〇〇三
- ◆ 宜南诗社的人们 〇一四
- ◆ 广东风云 〇二八
- ◆ 鸦片战争 〇三九
- ◆ 《南京条约》之前 〇五三
- ◆ 反叛者 〇七一
- ◆ 太平天国的旗帜 〇八一
- ◆ 军阀诞生 〇九一
- ◆ 光荣与挫折 一〇一
- ◆ 火烧圆明园 一一八
- ◆ 外患艰深 一三〇



中华的飞跃

- ◆ 甲午之年 一四七
- ◆ 北洋败北 一六〇
- ◆ 屈辱之地 一七一
- ◆ 变法与革命 一八八
- ◆ 蒙难与溃灭 二〇三
- ◆ 义和团 二一九
- ◆ 激情的季节 二三二
- ◆ 辛亥风暴 二五〇
- ◆ 动乱不已 二六五
- ◆ 五四前后 二七七
- ◆ 十五年战争 二九二

年表

后记



斜
阳
和
黎
明





海陆的裂痕

清政权对结社自然异常敏感。统治层里的满族人口少，只要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团结反抗，满族政权应该会迅速土崩瓦解，所以清政府严禁结社。

清代出现各种各样的秘密结社。连不是反体制的、非政治性结社也受到政府的禁止，所以全部都成为秘密结社。虽然不允许结社，但有的职业离不开结社。

例如水夫。隋唐以来，南方的粮食、物资运往北方，这是为南北格局取得平衡所必需的，是中国地政学的必然。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是中国的大动脉，在这条漫长的运河上行船的水夫们就需要成立互助性的组织，否则无法安心工作。马戛尔尼等使节团来到中国的时候，当时还没有发明照相机，但留下了精致细密的铜版画。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运河河面并不宽敞，船只很容易遭受来自陆地的攻击。运载重要物资的船只必须做好防范匪盗抢劫的准备。

乾隆中期以后——18世纪末之前，清朝的“盛世”已过，国势开始倾颓。人口的急剧膨胀也是造成生活窘困的一个原因。农村无法养活这么多人口。乾隆时期，据说人口比一个世纪前增加了一倍，具体说，从两亿增长到四亿，而同期的耕地面积只增加百分之十几。农业技术几乎没有改良，按简单计算，人均收入减半。

生活贫困，流民自然随之增加，他们偷盗抢劫，为非作歹，为了生存采取违法手段。在政府眼里，他们是“匪”，所以必须彻底镇压，严加惩处。匪贼当然也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范，生死攸关之事，竭尽全力反抗。如果出现富有统率力的领导，把他们组织起来，可以成立力量相



当强大的集团。他们甚至袭击抢劫运河上的船只。船队自然也采取防御的手段，例如与沿岸的权势者联合实行保护，有的还雇用保镖。其实保镖也与匪贼的出身阶层差不多。

治安混乱，人们为了自卫，便团结起来。尤其强烈感觉团结深有必要的是水夫、搬运工、行商、在举办庙会时的肩挑小贩等这样的出外干活的人们。这些人成立的自卫性组织当然是非法的。因为禁止结社是政府的原则方针。

说得极端一点，在那个时代，只要是结社，就只能是秘密结社。即使不是反体制的结社，也不会得到政府的承认，所以只好采取秘密结社的形式。虽然禁止组织社团，但政府起初对宗教信仰的社团也是睁一眼，闭一眼。后来，白莲教及其同一系统的混元教、天理教、清水教等进行反政府活动，连宗教信仰的结社也遭到镇压。

第六卷说过，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徒冲进紫禁城，当时发射的箭矢至今还留在隆宗门的门额上。这是一种宗教的暴动，各地都有发生。组织结社最合适的条件就是以宗教信仰为核心。只要宣传信仰的功德，就可以聚集众多人，以信仰作为加强团结的精神纽带。

清中期以后，时常发生利用宗教结社的反乱。一说到反乱，可以说必定都与宗教牵连在一起，而且似乎反乱的次数有点过多。

虽然也有与宗教信仰无关的民众反乱，但政府方面全部统归为宗教暴乱。如果是纯粹的民乱，说明地方官的执政不得民心，会被问责处刑。一旦城市在民乱中失陷，地方官会被判处死刑。如果是宗教暴乱占领城市，地方官只是被撤职，不会被杀。因为宗教暴乱一律被认定为邪教，被视为超越政治的异常现象。邪教产生于与政治不同的世界观，所以不是政治家的责任。基于这样的想法，也就把民乱说成是邪教的暴乱。

在需要组织社团的职业人中，最热心组织社团的是水夫。因为只要上船，大家都是风雨同舟，生死与共，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具有团结的力量。他们在成立自卫、互助的团体时也采取宗教信仰的形式，称为“设教”。

“水夫设教”成为清代的一大政治问题。水夫的组织必须是大规模的团体，像大运河这样，这么漫长的河岸线，需要地区广泛的组织才能覆盖运河沿线地区。如此庞大的组织不仅对清代，甚至对近代都产生



巨大的影响。

大运河的水夫，据说起初多是北方人。首都北京居住着皇室以及众多的贵族（满洲旗人）、高官，他们的俸禄都是用大米支給。北方不产大米，只能通过大运河源源不断地运来。大运河的起点是鱼米之乡的江南。北方的水夫来到江南运米，肯定不太习惯南方的生活习惯和气候水土。于是，居住在杭州的有权势的北方人为他们提供食宿。中国人原本具有浓厚的同乡意识。这可以说是定居的农耕民的习性吧。

为北方水夫提供生活方便的主要是钱氏、翁氏、潘氏，他们修造庵，分别称为钱庵、翁庵、潘庵。这些庵不仅提供食宿，也附设有医疗设施，甚至还为死者准备好墓地。这虽然是一种侠义的行为，但据说三个庵的主人都是禅宗的一派罗教的信徒。于是罗教自然而然地在水夫中传播开来，蔓延扩大，成为他们维系这个团体的纽带。

罗教是明代一个名叫罗祖的人开创的禅宗的一个派别，主张“无为解脱”，所以又称为无为教。罗祖原先是运粮的军人，也许运粮的水夫对他有一种亲近感。

往北京运粮的水夫还有一个必须团结起来的理由：船只北上运粮，南下则因无物可运，多为空船。但如果利用空船运送违禁品，可获暴利。起初是运盐。盐是政府的专卖品，其利润为成本的十几倍。民间销售私盐，即使价格比官价便宜很多，依然大有赚头。但如果被政府发现，必遭严惩。只要挂着御用商人的旗帜，向各地官员贿赂，运送私盐应该不会困难。不过，只要同船的水夫出现一个叛徒，那就非同小可。因此，水夫的团结更加坚强。

贩运私盐以后，随着时代的变化，加上鸦片，买卖越干越欢。不言而喻，这是极其危险的营生，需要牢不可破的团结，因此有的开始举行可怕神秘的仪式。

虽然是秘密仪式，水夫组织的覆盖地区十分辽阔，根本无法隐瞒。于是他们就将已经公开化的组织起名为“安清帮”。“帮”是帮派的意思。这个名称的含义是“安定清王朝的集团”，标榜爱国，为政府出力。

这个组织后来称为“青帮”，成为中国黑社会的标志。其母体是杭州的三庵，所以根据地是江南地区。

起初使用对政府迎合性的名称“安清帮”，但是清朝政府本来就

是对结社神经过敏，经常颁布“水夫设教之禁”。

安清帮——青帮从职业行会变成黑道组织，所以在成立当初并没有什么政治意图。同样都是秘密结社，“天地会”从一开始就具有极为浓厚的政治性。

满族统治中国以后，汉族的反抗不得不潜入地下。最后的公开的反抗是占据台湾的郑成功。潜入地下的反清运动组织是天地会，这是一个政治性的秘密结社，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天地会的秘密远比青帮多，而且必须严守。青帮的罪行是私贩违禁品，天地会的罪行是谋反，一旦被抓住，就要掉脑袋。所以加入天地会比加入青帮的审查更加严格。

有关天地会的资料十分庞大，然而连它的源起都无法知道。既然是绝密的组织，也是可以理解的。虽说有关天地会的资料庞大，但不是天地会方面的资料，大部分是被政府抓获的天地会会员（被抓的是否真的是天地会会员，多有疑问）的供述。有的不是天地会的会员，被抓进去，经不住严刑拷打，就胡编乱造供词。当然也有的会员把自己所知道都一五一十全盘招供；也有的会员为保守组织秘密而故意供述假情况。由于这些缘故，庞大的资料究竟有多少可信度值得怀疑。

清末，不少组织自称天地会，南方尤其多。然而，它们是否是真正的天地会，不少令人怀疑。也有的人本打算加入天地会，可是加入以后，发现不是真正的天地会。

关于天地会的源起，有人认为是江西少林寺的余党，也有的认为是台湾郑成功的系列。这个组织在华南以及清王朝统治鞭长莫及的东南亚尤其根深蒂固，看来源起台湾的观点比较具有说服力。

经过森严肃穆的宣誓仪式后入会，叫作“入洪门”。他们称为“洪门兄弟”，为什么这么称呼，甚至说不明白确切的原因。各种各样的说法，比较靠谱的是明代皇族后裔朱洪英受到天地会的拥立，或许因为天地会创建初期有一个姓洪的人是领导。

天地会还有三合会、三点会、三星会、哥老会等别名，但有人认为这些不是别名，而是天地会中其他派别的名称。三点就是三点水，也许暗指“洪”字。有人认为“洪”字具有正如东江、西江、北江三条河流





在广东汇合一样，各色各样的人为了民族革命这个目的共同走到一起的含义。如此诸说纷纭，正好说明至少天地会在创建初期严守秘密。

由于入会者皆互相称兄道弟，所以该组织又叫作兄弟会或哥老会，不过这似乎是在四川，也许起先是与天地会没有关系的其他组织。汉人中普遍存在反对满族、恢复汉族国家的愿望，要宣传这种思想，并付诸实行，自然必须是秘密团体。各地产生的秘密组织大概有不少悄然合并。

孙中山开始反清革命的时候，曾经打算与天地会系统联合。对此各家评价不一。只是到清末的时候，天地会与青帮系统的秘密结社往往被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它们也进行过联合行动。

从嘉庆年间（1796—1820年）白莲教起义频仍的时候开始，潜入地下的秘密组织逐渐浮出水面。这暴露出清朝维持治安能力的急剧下降。

嘉庆帝是在清入关迁都北京大约一百五十年之后即位的，在这一百五十年间，身居统治阶层的满族养尊处优，逐渐流于文弱。满人全部是军人，这是太祖努尔哈赤以来的传统，八旗制度的精神支柱。旗就是军营，满族不分男女老少，全部都有军籍。满族原则上不接受高等文官考试的科举，就是说，不许满人成为文官。

少数民族满族统治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所依靠的就是武力。人口本来就很少，所以必须全族皆兵以维持统治汉族的武力。但满族作为统治地位的民族，享受各种各样的特殊待遇，必然逐渐丧失勇武的活力，出现与军人背道而驰的现象。曾经在辽东、黑龙江的深山老林中追逐狩猎野兽的满族似乎在北京荣华富贵的生活享受中磨灭了它的野性。

这在三藩之乱中就已经显露出来，驰骋沙场立功的主要是汉族部队，满族将军尽量不让自己的军队参加作战。据说与吴三桂对峙的岳州城下的满族将军整整八年关闭军营，不思打仗。

清初的满族之所以能够扫荡中国，是在明朝内讧和人民疲惫的时候乘虚而入，未必说明满族军队的强盛善战。消灭明朝残存势力的主要是吴三桂等汉族将军。有人认为满族军队自入关以后，没有参加过一次大规模的作战。

嘉庆四年（1799年），退位的太上皇乾隆帝正月八十九岁死去，其宠臣和珅被赐死。开始平定四川的白莲教起义也是在这一年，但是在改变以往的做法后才出现的成效。四川总督兼经略大臣勒保在奏文中



说道：健锐营、火器营（都是满族军队）不惯劳苦，不守纪律，行军迟缓，为绿营（汉族军队）所轻蔑，所以全部返回北京，也不必派遣满族的其他部队来补充。勒保是满人，他对本民族的部队已经失去信心。

嘉庆帝更换勒保，试图对军队进行整顿。勒保一方面在奏文中表示不必派兵增援，一方面却要求拨给五百万两军费。另外，他虽然抓俘起义首领王三槐，却没有剿灭其残余势力，这也是他被撤职的原因之一。能够活捉王三槐，其实也是当地深孚人望的南充县知县刘清劝降的结果。勒保还任人唯亲，重用亲戚以及自己派系的亲信，克扣军饷，不按时将粮食发放给士兵。弹劾勒保的是四川将军福宁。

这个福宁也是满人，其实他也有自身的问题。他在湖北旗鼓寨包围白莲教，将投降的两千多人斩尽杀绝。这样做当然是为了夸大战功。他这样做导致当地的造反集团不信任政府的“招抚”政策，下决心顽抗到底。清朝对各地造反的镇压越发棘手。这件事情被揭露以后，福宁被捕，交给刑部，以杀降律问罪论处。

总兵马瑜等杀害夹河州的难民两百多人，谎报是匪贼。此事被揭发以后，马瑜被处死。

这不过是冰山的一角。军队，尤其是满洲八旗的腐败登峰造极。驻守北京的八旗军官每天只是游玩享乐。军队每年秋季举行一次“秋阅”，据说他们多半只是在秋季检阅军队的时候身穿军服。所谓军服，就是头盔铠甲，相当沉重。据资料记载，一般都是随从拿着军服到检阅地点，军官临时换上，完全是走过场的检阅军队。

讨伐教匪的时候，也是当地招募的义勇兵打头阵，汉族的绿营紧随其后，满洲军队则殿后，最为安全。

在当地招募的义勇兵称为“乡勇”，也分为两种：一种是作战结束后依然回家种地，另一种是作战结束解散后变成匪贼。嘉庆年间讨伐教匪，都是乡勇在第一线冲锋陷阵。为下一次发生反乱时方便使用，打完仗后，乡勇可以把武器带回家。这就造成武器散落民间，民间也具有潜在的武装战斗力。清朝改变了原先的满族为军队骨干、原则上不许民间存在武装力量的基本方针。

这样做对清政府是危险的，但不依靠乡勇，地方的叛乱就无法镇压下去，所以改变基本方针实属无奈，不得不依靠乡勇。这也说明满族



军队变成了一群废物。

由于嘉庆帝采取整顿军队和依靠乡勇的走钢丝的政策，终于平定了教匪之乱。从白莲教系统的反体制派来说，暴露出不能团结一致弱点。由于横向联系不够，清政府以各个击破的方法镇压教匪之乱。

在同一时期，海上也发生叛乱，刚刚即位的嘉庆帝不得不在海陆两条战线上与叛乱势力作战。陆地上的反乱势力之间都无法互相配合，海陆之间更谈不上联合作战。

这个时期海上出现反乱势力与越南的政治形势深有关系。当时越南称为安南国，是受到中国册封的国家。

从名义上说，安南在乾隆末期之前一直是黎氏王朝，但实权早已旁落到将军手里，尤其是郑氏和阮氏。阮氏又称为广南王，但在西山党之乱时政权被消灭。此后越南陷于混战状态。消灭广南阮氏的也是姓阮的三兄弟，幼弟阮文惠实力最强，称光中帝。长兄阮文岳是亲清派，来到北京拜谒乾隆帝。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清军南下，叫喊着要复兴旧黎氏王朝，但大败于阮文惠。这样，阮文惠政权与清朝交恶，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阮文惠死后，其子阮光缵继位，双方关系未见好转。

阮文惠、阮光缵政权为维持国家财政，招募海盗，打算“海盗立国”。一到夏天，越南的海盗集团就进入广东海面骚扰抢掠，秋天返回。他们进入清国海域是海盗，回到越南就是将军。越南海盗不仅出现在广东海域，还扩大到福建、浙江海面，与当地的悍民勾结在一起肆无忌惮地抢劫掠夺。

清国称他们为“艇盗”。夷艇不仅吨位大，配备的大炮数量也多，清朝当局束手无措。一旦抓获扣押夷艇，有时搜查出阮氏的敕印，便向越南政权提出严重抗议，但对方装聋作哑，一口咬定不知此事，推诿耍赖。

艇盗之乱的核心人物是一个名叫蔡牵的福建省同安县人，他在海上征收通行税，简直就是海上霸王。通行税的数额是每艘商船出港四百元，进港八百元。

浙江巡抚阮元命令定海总兵李长庚采取对策，李长庚也是福建同安人，与蔡牵是同乡。这是一对宿敌，他们的海上决战极其波澜壮阔，



但无法在这里详述。

清朝史料记载，蔡牵是“奸猾”的海贼，李长庚则是击败海贼的名将。不过，能够统率众多海贼征收海上通行税的蔡牵绝非等闲鼠辈，应该具有相当出色的本领。他与天地会的关系不得而知，但他活动的区域正是天地会势力强盛的地方，二者应该有某种关系。蔡牵葬身海底，他被定性为叛徒，很少人为他辩护。即使有人提出辩护的观点，大概也已经被清朝抹得一干二净。他也有可能是一个激进的民族主义者。

同样是艇盗的主要人物，蔡牵属于后期，关于前期的艇盗，前面说过，以越南的阮氏政权作为后盾。岂止是后盾，完全可以说是越南政权直接指挥。但是，这个政权很快灭亡。阮氏三兄弟在西山党之乱中摧毁旧阮氏的时候，旧阮氏王族中只有一人阮福映幸存下来。后来阮福映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于嘉庆七年（1802年）杀死阮光纘，灭亡这个海盗立国的政权。

阮福映的复兴具有法国势力的背景。当时西风开始强劲吹来。越南的新政权阮福映请求清朝对他册封，这意味着恢复以前的友好关系。因此，他必定严厉取缔在中国领海上出没的海贼船。失去越南政权保护的海贼称为后期艇盗。

浙江巡抚阮元命令李长庚制造比夷艇更大的船只。以前夷艇比清国水军的船只体积大，这样一来，蔡牵命令部下也加速建造比清军新船——称为霆船——更大的船只，双方军备竞赛，船只越造越大，当然也包含着激烈的技术竞争。

嘉庆八年（1803年），李长庚在定海大破蔡牵。这个时期，艇盗方面由蔡牵和朱溃共同指挥，但在定海战败以后，两人分道扬镳。据说副司令朱溃违反蔡牵的命令是战败的原因。蔡牵向闽浙总督玉德行贿才逃过这次危机，他为了重整旗鼓，收买福建的造船业界，重建船队。建造出比霆船更大的船只。他利用这支新建的船队攻打台湾和福建，以台湾为根据地，自称镇海王。

李长庚进攻台湾，这一对宿敌的激战在陆地海上打得难解难分。李长庚在福建、广东的海战中几乎将蔡牵逼到绝境，但在潮州的黑水洋作战中被蔡牵的部下射死。据说当时蔡牵的船队只剩下三艘船。这是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顺便提一下，这一年的七月，琉球国中



山王尚温死去，其孙尚灏即王位，照例派遣册封使从福州前往琉球。当时李长庚与蔡牵正在福建的海面上殊死拼搏，可以想象册封使的航行相当危险。

李长庚葬身大海，蔡牵的日子也不好过。他与分道扬镳的朱溃再次联合起来，船队的实力一度有所起色，但由于不断遭到李长庚的挑战，船队被打得满身疮痍，只好逃到越南躲藏起来，恢复元气，以待时机。清朝政府通过整顿军队，基本上平定了白莲教系统的叛乱，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南海的反体制势力。清朝加强沿海的警戒力量，使得蔡牵不能像以前那样可以与陆地的反体制力量联络呼应。他的船队在粮食与淡水的补给上相当困难，买卖也难以维持下去。所谓买卖，就是袭击商船，商船的航行受到前所未有的严密护卫。

同时，清朝政府的劝降工作大有成效。蔡牵的手下接连投降，由于买卖搞不下去，部下不得已只好改换门庭。水夫有一定的技术，清朝政府也需要他们。

清朝政府为继续讨伐艇盗，提拔阵亡的李长庚的部下王德禄和邱德功分别为福建提督和浙江提督。恢复担任浙江巡抚的阮元挑拨离间蔡牵与朱溃的关系，收到成效。朱溃死于官军的炮火，其弟朱渥率领部下三千、船四十二艘、炮八百门在福建投降。

蔡牵孤立无援，最后在定海的渔山外洋与邱德功率领的政府军抵死血战，兵败自沉。

艇盗之乱终于得以平定。蔡牵的自沉是在嘉庆十四年（1809年）八月。第二年，广东海贼张保投降，南海重新风平浪静。这样，陆地与海上的叛乱都被镇压下去，但累累伤痕，无法平复，无论是陆地还是海上，都留下深深的裂痕。

问题繁多，蔡牵第一次在定海失败的时候，曾贿赂闽浙总督玉德得以逃脱危机，果真是这样的吗？

李长庚是一个优秀出色的海军将领，但也许由于不善于协调的缘故，与总督玉德关系不和。如果蔡牵彻底失败，李长庚便立下头等大功，大概玉德就打算从中作梗。清朝政府得不到“人和”。

蔡牵以台湾作为根据地，聚集两万多人，说明这个岛屿上有这么



多人对清朝心怀不满，而且只要出钱，福建的造船业界就会为艇盗建造比官军的霆船性能更强的船只。这是因为福建的造船业界对政府的命令熟视无睹呢？或许是玉德试图利用蔡牵的重整旗鼓抵消李长庚的功绩。据说玉德的继任者阿林保与李长庚的关系也很紧张。

李长庚的得力干将印得方在李长庚阵亡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说是因为非常愤慨玉德、阿林保对待李长庚的态度。最后征讨蔡牵的时候，清朝政府打算起用印得方，派人寻找，终不知去向。

在蔡牵陷于绝境的时候，官军中还有人将粮食、武器偷卖给他。这只是为了金钱吗？清朝军人中堕落的似乎不仅仅只是满洲八旗。谁都明白，嫉妒、利益的作祟对军队极其不利，他们缺少的是忠诚。

陆地海上的叛乱虽然被平息下去，但军费支出极其庞大。乾隆帝的宠臣和珅每年搜刮的财富相当于国家收入的一半，令世人惊愕万分，紧接着又是如此巨额军费开支。清政府的财政也已经陷入困境。

本来就内外交困，再加上鸦片进口造成的漏银问题，开始对国民生活和政府财政产生巨大的压力。鸦片进口的增加与陆海叛乱的频仍发生在同一时期。可以想象，接连不断的反乱笼罩着鸦片的阴影。

人口的增加的确是造成流民增加的重要原因，但善于忍受、恋土思乡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流民，固然因为收入减少，重税的征收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政府并没有宣布增税。由于银本位制的纳税体系实际上使用铜钱缴纳，鸦片贸易导致银元的暴涨，从而造成实质上的增税。官府对无力纳税者的处罚十分严厉，所以他们只好四处逃亡，有的是集体逃亡。收留他们的主要是白莲教系统的反体制教团，或者是强盗、私盐等非法组织，还有就是私卖鸦片的组织。这些团体扩充势力以后，就会起事造反。

逃跑后，造反军的老家自然会遭受搜查，这正是官员大发横财的大好时机，为了防止抄家被折腾得鸡犬不宁，还要受到刁难欺辱，百姓只好给官员行贿，让他们在搜查的时候手下留情。人民对官员乃至政府不仅完全丧失信任，甚至产生憎恶的情绪。

人们切身体会到康、雍、乾三代的盛世已经一去不复返。乾隆时代也有战争，但远征西域、缅甸的对外征战的动静过于突出，掩盖了对山东白莲教、台湾林爽文等内乱的平定，给人一种偶尔发生的感觉。至嘉